

哲学史

81 今日与明日哲学

作者：惠顿学院亚瑟·霍姆斯博士

在最后一节课上，我决定与其继续赘述一些新的内容，不如以一些比较概括性的评论作为结尾。显然，哲学史尚未完结。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我们即将结束哲学史的学习时，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因为历史仍在继续。

那么，让我简要地概括一下当今哲学的一些显著特征，同时展望一下未来，因为你们当中那些对哲学持续感兴趣的人，未来也会对它更加感兴趣。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可以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当今哲学的第一个普遍特征，我想你们应该已经有所了解，那就是欧洲大陆思想与英语世界哲学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也被描述为现象学（一种现象学传统）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差异。

然而，问题在于，正如经验主义的概念已经扩展，以至于密尔和罗素笔下狭义的经验主义不再适用（这要归功于日常语言和其他领域的拓展和开放），“分析”一词的含义如今也变得极其宽泛。它不再仅仅指罗素的逻辑分析，也不再仅仅指日常语言分析，而几乎可以指任何试图分析概念、分析论证，并在此意义上进行更深入思考的哲学。我记得几年前在北伊利诺伊大学参加一个哲学会议时写过一篇论文，与会者之一梅森·迈尔斯（Mason Myers）在看完论文后对我说：“你是一位分析哲学家。”我从未认为自己是分析哲学家，但我当时正试图思考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我想在他的书中，这让我成为了一位分析哲学家。因此，如今的术语在这方面要宽泛得多。

它们是不同的哲学风格。如你所知，现象学家倾向于描述而非构建论证。他认为，当你看到所描述的事物时，你就能理解其含义。

真理已经显现，而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们则更倾向于罗列正反两方的论据和理由来得出结论。但这只是方法论上的差异，也是意图上的差异。这种历史遗留的分歧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我认为，双方之间缺乏相互理解，也常常缺乏相互尊重。

分析哲学家常常贬低现象学哲学家，而现象学哲学家也常常贬低分析哲学家，这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局面。事实上，在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地区——也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和东部地区——哲学界已经变得相当政治化，以至于整个哲学界都严重分裂。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杰出人物成功地在两个阵营中都站稳了脚跟。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理查德·罗蒂。他那本极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著作《自然之镜中的哲学》借鉴了从维特根斯坦到伽达默尔再到福柯等众多思想家的观点，可谓兼具两大阵营的特点。而远在另一端的伯克利，休伯特·德雷

福斯（Hubert Dreyfus）似乎也成功地游走于两者之间，并能与两大阵营的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

但美国大多数哲学系在某种程度上，从广义上讲，都以分析哲学为主，可能只有一两个现象学家。当然也有例外。少数几个哲学系以现象学为主，可能也有一两个分析学家。

我立刻想到了那些现象学色彩浓厚的大学。其中一所是匹兹堡的杜肯大学，另一所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有些人试图两头兼顾。例如西北大学，尽管实际上他们因此拥有两个不同的研究生项目。还有波士顿学院、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等等。

但总体而言，美国哲学属于经验主义和分析主义的范畴。这就是其方法论特征。正因如此，我倾向于对那些想继续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说：除非你能接受一定量的分析主义内容，否则最好不要涉足这一领域。

如果你无法处理如此细致的工作，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那就不要继续从事哲学研究。如果你真正感兴趣的是思想史，而不是研究问题、论证和概念等等，那么或许你应该继续研究思想史，而不是哲学本身，因为哲学往往更加注重细节。不过坦白说，我认为思想史在思想史领域的影响，远不及哲学在思想史领域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想亲身参与塑造历史，那就去研究哲学；如果你喜欢回顾过去，那就去研究思想史。以上是第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第二个概括性特征是，在西方思想中——你知道，现在很难定义“西方”的含义。一两年前，我们指的是铁幕以西的地区。是的，我们仍然沿用这个定义。

西欧和英美哲学。就总体立场而言，主要属于科学自然主义。那么，用通俗的话来说，世俗人文主义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所说的科学自然主义，当然是指以科学知识为唯一真理的取向，以及哲学自然主义。它也是西方大学界的一种哲学思潮。但需要加以一些限定。

基督教有神论是宗教哲学中的主导哲学，毫无疑问，它主导着英美思想界的宗教哲学。20、30、40年前并非如此。上个世纪之交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当然，在此期间，世俗化进程有所加速。但我记得在五十年代，我参加了在圣路易斯举行的美国哲学协会年会，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年轻天主教信徒，名叫詹姆斯·罗斯，他有点愤世嫉俗，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上帝存在的苏

格兰论证》的论文。每个人都试图驳斥他，挑剔他的论证漏洞，但他一一抵挡住了。

当观众们离开房间时，我听到一位哲学家对另一位说：“这肯定有问题。我说不出哪里有问题，但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这真是五十年代的典型特征。

大约十年后，或许十五年后，在圣路易斯同一家酒店，我主持了美国哲学协会的另一次会议，与会的三位是宗教哲学领域的学者。他们分别是：密歇根大学的福音派学者乔治·马夫罗迪斯；西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天主教平信徒迪克·帕蒂尔。

斯坦·凯恩，来自迈阿密和俄亥俄州，有福音派背景。我们四个人，都是公开的基督徒，正在就邪恶问题进行小组讨论，结果却被挤得水泄不通。这绝对不可能发生在50年代。

如今，没人会对此多加评论。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人人都知道。宗教哲学，这门学科的前沿领域，正由基督教思想家——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福音派信徒——来定义。

在过去的七年、八年里，美国哲学协会中部地区分会的四位主席都是——我刚才说了吗？——福音派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福音派信徒。他们是阿尔文·普兰廷加、威廉·奥尔斯顿、艾伦·多尼根，还有几周前卸任的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

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闻所未闻的。所以，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人们希望，展望未来，这种基督教在哲学领域的影响力能够像在宗教哲学领域一样，扩展到哲学的其他领域。

现在，它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中有所体现，因为宗教哲学本身就涉及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它在伦理学中也有所体现，但在其他领域，它的主导地位远不及在宗教哲学中那么重要。主导地位仍然是科学自然主义。

奎因等人的影响。然而，对这一概括还需要补充说明，这与后现代主义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出现有关，尤其是在科学哲学中反实在论的表现形式。

伦理学中的反实在论。认识论中的反实在论，如理查德·罗蒂等人所著。宗教中的反实在论，尤其是在神学领域，而非宗教哲学领域。

也就是说，职业神学家中的反实在论倾向比职业宗教哲学家更为明显。因此，在许多大学里，基督教正统观念在哲学系比在神学系更为突出。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如今哲学家从事的神学研究比神学家更多。

但后现代主义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包括宗教思想的多元主义，无疑已经显现。它是否会对科学自然主义的统治地位构成真正的挑战，还有待观察。我个人并不认为会。

我不认为情况会如此，因为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反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只不过是老调重弹罢了。就此而言，这就像是复活节的复活。也就是说，我们在认识论领域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历史，可以追溯到与之相反的认识论哲学资源。

所以我并不认为这种后现代相对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会占据主导地位。我确实认为它会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关键议题。但我并不认为它会在任何意义上占据主导地位。

还有一些近期发展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并不断发展。我上次提到的形而上学研究，正是源于语言哲学的发展。我倾向于认为，形而上学的发展将具有自我维持的能力，而不是依赖于语言哲学的发展。

语言哲学这种东西，在你被灌输了形而上学毫无意义的观念之后，或许才真正需要去涉猎。但一旦你开始研究，它就会变得自给自足。你不需要在语言哲学上投入太多精力就能保持这种状态。

因此，我预计形而上学的发展将会持续下去，尤其会侧重于身心关系。身心问题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领域。身心二元论也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哲学捍卫者，例如理查德·斯温伯恩，他几年前就来过我们学校。

伦理学的变革也可能持续下去。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应用伦理学的回归。为什么是回归呢？纵观历史，伦理学一直以应用的角度进行探讨，像边沁和密尔这样的人就曾这样做过。

而介入其中的是元伦理学的讨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G. E.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他在书中开始探讨善的意义，并发展出他的直觉主义立场。伦理术语的意义也同样如此。

当然，AJ·艾耶尔的论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他认为这类术语没有经验参照。因此，如果它们没有经验参照，那么道德判断也就没有事实意义。而要克服这一点，就必须再次关注元伦理问题。

如果伦理术语确实有意义，那么它们的含义是什么？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本世纪初的四五十年间，哲学伦理学的关注点几乎完全集中在元伦理问题上，应用伦理问题几乎被完全忽略。但部分原因是这一障碍被克服，部分原因是六十年代的行动主义，应用伦理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独立领域。这一点，看看惠顿学院这样的院校的课程设置就能明白。

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学院竟然没有应用伦理学课程，这真是令人惭愧。我想，六十年代的冲击正是由此而来，犹如晴天霹雳。在我看来，课程设置方面最先做出的改变也是在六十年代，当时越南战争的征兵问题牵动着男学生们的心，许多人为此苦恼不已。

我开设了一门名为“战争与基督教伦理”的课程，由此衍生出一本论文集，您可能在书店里见过。这本书一度绝版，但在海湾战争期间又重新出版。出版商反应迅速。随着越战的平息，这门课程扩展成了我们之前称之为“社会伦理”的课程，现在则更名为“伦理、法律与社会”。

但实际上，这是惠顿学院近些年来开设的第一门应用伦理学课程。好了，现在你知道我们开设的课程有哪些了。商业伦理、生物伦理、媒体伦理、伦理与国际事务等等等等。

但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应用伦理学是全国最大的哲学产业，而且应用伦理学领域一直都有就业机会。

所以我相信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因为它回归了哲学家们历来所做的工作。然而，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之一，对于从事哲学研究的基督徒而言，是哲学伦理与神学伦理之间的关系。

哲学伦理学和神学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多年来，它们在这方面一直有些各自独立。总的来说，神学伦理学家一直在探讨伦理生活的动态变化。

也就是说，神学伦理探讨的是罪与恩典等概念。而哲学伦理则关注伦理决策问题，将原则应用于决策之中。因此，由于二者的研究方向不同——神学伦理和哲学伦理的研究方向不同——神学与哲学之间的融合相对较少。

除了某些显而易见的观点，例如神命论或自然法伦理学等等，其他方面都存在差异。然而，德性伦理学的发展正在产生影响。你可能还记得，德性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推动的。

我今天早上给他打过电话，想邀请他来参加我们在93号举办的会议，但他拒绝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尝试。我想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尝试了。

但麦金泰尔的《德性之后》一书引发了这一趋势。他在书中将启蒙运动中所有不光彩的事物都归咎于原则和决策的伦理，并呼吁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传统。显然，这一发展正在并必将对哲学伦理与神学伦理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为如果你谈论德性的发展，你实际上是在谈论道德生活的动态，以及涉及罪与恩典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自己的鲍勃·罗伯茨的作品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顺便一提，他正处于德性伦理研究的最前沿。

他的著作经常被期刊文章引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清晰地融合了基督教对人性、罪与恩典的理解，同时又运用维特根斯坦式的分析方法探讨价值概念和美德概念，孜孜不倦地探究美德的本质、运作方式及其与恰当情感等的关系。因此，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从这些描述和展望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对基督教在哲学领域存在的关注。

我希望你们能理解这种担忧。我希望你们已经注意到，这种担忧贯穿了整个哲学史。实际上，这就是故事的全貌。

熟悉吗？我们讨论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传统。在有神论哲学传统中，也就是从有神论视角出发的哲学，也存在着多种类型——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显然是三大主要有神论宗教。同样，在基督教有神论传统内部，也存在着多种类型。

所以，当我谈到基督教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我想从四个方面来描述它。第一点是作为一种视角传统。也许这本身就有两种正确之处。

这里的“传统”指的是基督教思想在哲学领域有着延续的历史。我特意用了“传统”这个词。有时，基督教哲学家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做哲学就应该把自己的神学信仰、态度、价值观和关切都抛诸脑后。

我认为这不仅不人道，而且对人类来说根本不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的现象学方法吗？悬置判断，也就是暂停判断——笛卡尔曾尝试过，但这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

笛卡尔不是这样想的，胡塞尔也不是这样想的。明明内心并非中立，却还要装作完全中立，这是一种自欺欺人。

因此，在我看来，诚实的学术道路在于坦白。也就是说，要直截了当地说明你的立场。承认这一点。

看看这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你的思考。看看其他人的立场会如何影响他们的思考。并据此做出相应的调整。

当两者一致时，当然很好，你们达成共识了。但两个人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相信同一件事。

所以，我指的并非在中立的基础上进行论证。有些人使用“预设”这个词。在我看来，“预设”指的是演绎论证的前提。

预设有点像基础主义的前提。只不过，既然是预设，它就不是无可置疑的基础。嗯，就“预设”这个词所蕴含的——至少，或许是指称的——这种演绎体系的基础主义模型而言，我不想说基督教哲学是在运用基督教的预设。

我更愿意用“视角”这个词。“视角”这个词让我能够表达，这里不仅包含我认为正确的明确命题，还包含某些价值观和考量，它们驱动并指导着我的选择过程和思考过程。你看，视角是由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

所以，这是一种后思辨传统。其次，我想说基督教哲学是探索性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而非最终成果。

哲学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最终产物。认为哲学研究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想法，掩盖了哲学探究的持续性本质，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哲学就像一场历史性的对话，参与者既有志同道合的人，也有持有不同信念的人。

对话，就像柏拉图的对话一样，永无止境，一直在继续。所以，我认为哲学史也尚未完结。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空谈。第三，除了以上两点，我还想说这是一项多元化的事业。我尽量不使用定冠词来指代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哲学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传统。这种多样性源于不同的哲学方法、不同的哲学观点，当然也源于不同的神学传统，而这些因素会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产生影响。

正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造就了我们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这种多元化是健康的。如果你珍视那种能让你不断思考、成长并自我修正的内在批判过程，那么你需要的就是那些与你意见相左的人。

在我看来，基督教传统和教会内部的多样性，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健康的，尽管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它应该让我们保持自我批判，保持谦逊，避免像人类那样走向极端。我们人类总是笨手笨脚的。

所以，要注重多元化。然后，我想补充一点，要注重整体性。在我看来，基督徒在哲学领域最应该着眼于整体，而不是目光短浅、视而不见，只局限于哲学某个分支学科的某个细分领域。

不，无论一个人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基督徒当然需要把握全局，从基督教世界观的角度看待事物，并据此调整方向。在我看来，这具有诸多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很可能指导你选择研究方向，就像哲学家选择研究方向一样。让我用你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来做个类比。

从你确定专业的那一刻起，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一直追问你这个问题。这基本上是一个你需要在基督教世界观的框架下思考的问题，它关乎你如何管理自己的人生和天赋，以及哪些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等等。我记得几年前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基督教哲学家协会会议上，我参加了一个小组讨论，阿尔文·普兰廷加也在小组中，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谈谈基督教如何影响我们的哲学。

普兰廷加站起来说，嗯，我认为它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我选择的研究方向上。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从战略角度来看，问题在于基督教世界观的整体性质。我认为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

如果仅从这个角度考虑，确实会带来一些不幸的后果。例如，如果我们像最近那样招聘哲学领域的职位，并开始收集大量的求职信、简历等等，你会发现其中90%都与宗教哲学相关，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最不需要的领域。因此，在我看来，管理问题不仅要从基督教思想的战略角度来考虑，更要从基督教哲学在当今历史阶段的整体战略角度来考虑。

你们看到的是更宏观的图景。所以我建议你们中的一些人考虑转向形而上学、科学哲学领域。而我认为，所有哲学领域中最被忽视的是什么呢？美学理论。

美学理论。嗯，让我想想。

举个例子来说，我现在正在研究的，我之前可能提过，已经研究了两三年，还会再研究两三年，本质上是道德判断的客观基础。客观现实的基础是什么？你看，这是伦理学的基础。你也已经接触到我这一年来发现的一些东西，因为它涉及到历史。

我希望在我最后一次教授这门课程的时候——大概是几年之后——能够把我在课程中发现的所有内容都融入到课程里，但恐怕不行。所以，你们还得继续关注。这门课程最终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原因很简单，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么，哲学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它仍在发展之中。在我们用这15分钟时间进行讨论之前，我想最后说的是，哲学的未来走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像你们这样的人。

我是认真的。在我教授这门哲学史课程的几十年里，你们这些学生，无论部分还是全部，都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有大学校长。

有神学院教授，有从事哲学研究二三十年的学者，也有哲学界以外的人，比如马克·诺尔和罗杰·伦丁。

这些人通过他们的工作，塑造了基督教思想史，并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更广泛的思想史。历史正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历史是由像你这样的人创造的。

你会看到的。正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凭借着对自身天赋的妥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为哲学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做出贡献。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门课程，但像这样对当今哲学……以及未来哲学……的评论，就留给你们自己去填补空白吧。

多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好的，15分钟，提问，讨论。好的。

是啊，老东西的新版本。是啊。

是啊，你看，旧的是各种传统中既定的东西。新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東西。是的。

是的。如果其中一个传统是有神论传统，而另一个传统，用今天不同的方式来切可丽饼，是相对主义传统，好吧，为了引入后现代主义，它也是一种相对主义传统，这有什么新鲜的呢？嗯，智者的相对主义与智者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怀疑论者有所不同，智者和古希腊的怀疑论者，好吧，与大卫·休谟的怀疑论有很大不同，也与后现代主义有很大不同。那么，为什么它们不同，又是如何不同的呢？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者。

我记得读过一本18世纪写的书，叫《与怀疑论者共度的夜晚》。听起来像是电视出现之前那种轻松惬意的读物。但里面却充满了对皮浪、阿维利斯、卡尔内阿德斯等人的引用，以及其他一些内容。

但有趣的是，尽管它充满了对牛顿科学的引用，但显然它深受牛顿科学的影响，并且对牛顿科学进行了批判。休谟式怀疑论关注的焦点在于某些关键问题，例如必然联系的概念、归纳问题、理性能否决定道德上的对错等等。

现在，你来到这里。过去起作用的是牛顿科学。而现在起作用的是一种更具关联性、更有机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认识到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相互依存，因此，你的哲学在很多方面是由你的种族、性别、社会经济阶层决定的，你看，这仅仅是因为在这个有机模型中，事物是相互关联的。

你觉得会有另一种模式出现吗？嗯，我不知道。几年前，我曾经认为会有第四种模式出现，我称之为个人主义模式。

我想到的是苏格兰哲学家约翰·麦克默里，他现在几乎无人知晓，所以我很少提起他。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不过，约翰·麦克默里写过一本书叫《作为行动者的自我》，还有一本叫《关系中的人》。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或者，如果试图把它和你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那绝对是后康德时代的产物。康德关于人的概念，关于人的尊严，与一些更注重人格的存在主义者颇为相似，他们都强调“你”而非“它”。

“我-你”关系而非“我-它”关系具有显著区别。无论如何，他对这一点的强调被许多作家、哲学家、神学家、伦理学家等等所采纳，以至于他们开始在人与其他事物之间做出某种范畴上的区分，或者说范畴的区分。自然主义是一种还原论立场，怀特海形而上学的问题之一在于，他实际上将人简化为简单的复杂事件，而忽略了任何范畴上的区别。

麦克默里做出了明确的区分，我认为这非常有帮助。受他影响的作家中，有一位新西兰神学家罗伯特·布莱基，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什么来着？《世俗宗教与行动的上帝》，大概是这个意思。赫尔穆特·蒂利克虽然未必受到他的影响，但在他的神学中也发展出了类似的观点。

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发展，正如我所说，需要进一步发展。如果基督教信仰的关键概念不仅包括人格化的上帝的超越性，还包括人类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那么这就需要融入到比单纯探讨身心问题更深刻的理论之中。因此，我希望当今某些思潮的最终结果之一能够正是如此。

有趣的是，在应用伦理学领域——我在讨论实证主义以来的伦理学时也提到过——康德尊重人的原则正在被重申和复兴。如今，它在应用伦理学中的影响力或许比某些旧式的功利主义更为广泛。目前应用伦理学的三大主要原则或方法似乎是：功利主义、尊重人，或者某种契约论基础。

所以我认为，为了建立契约和尊重人的基础，如果你喜欢那种并非简单地追求万物（包括卷心菜和国王）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你需要一些范畴上的区分。卡尔？就先验知识而言，我认为我必须说不。我认为我必须说不。

也就是说，先天观念已被排除在外。如今讨论的先验性指的是“A等于A等于非A”这种逻辑真理的先验性。或许也存在其他类型的先验结构，但即使是康德式的范畴也承认，它们在新康德主义的方向上已经相当相对化了。

所以，不，我认为在这方面，总体倾向仍然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而且我认为欧洲思想也是如此，至少就先验的思维结构而言是如此。是的。你看，胡塞尔对意向性的强调与其说是一种思维结构，不如说是一种与他者建立关系的结构化方式。

所以我倾向于把现象学看作是一种更广泛的经验主义，它更注重内在感受而非外在感受。是的，所以，我不认为那种理性主义的方向得到了延续。有些人会说黑格尔延续了这种方向，但如今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已经非常罕见了。

好的，还有其他事吗？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们的检查结果周三就能拿到。有人还没收到检查结果吗？跟我来办公室，我那里还有一些。